引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要的脉络。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外来的佛教，构成近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道家与道教作为三教之一，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方面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以及风俗民情，等等，无不深烙着道家与道教影响的痕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因此，要想全面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道家与道教的思想理论、发展历史，以及它与中国古代文化各个方面的血肉联系，有所研究和认识。

近代多数中国学者认为：道家与道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习惯上有时也称道家为道教，或把道教称为道家、黄老。但严格说来，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它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道”作为最高范畴，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静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因此被称作道家。至于“道教”，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实体。顾名思义，“道教”的意思即“道”的教化或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企图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道教不仅有其独特的经典教义、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而且还有其宗派传承、教团组织、科戒制度、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宗教社团，与早期道家学派显然有所不同。

道家与道教虽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之间确有密切的关系。早期道家哲学关于道生万物、气化宇宙、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关于阴阳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思维，关于自然无为、清虚素朴的治国修身法则，以及其斋心静观、体道合真的认识方法，都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持法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道家的哲学理念、神仙家的养生方术、古代民间的巫术和鬼神崇拜活动，是为道教所吸收而构造其宗教神学、修炼方术和宗教仪式的三个主要来源。此外，儒家的神道设教思想和忠孝伦理，佛教的轮回报应观念、明心见性之说，墨家的均平思想和刻苦精神，以及阴阳家的占验数

术，等等，也都为道教吸收融摄。

道教形成宗教实体，大约始于东汉。从先秦道家发展为汉代道教，经历了数百年之久，这是道教的前史。道教形成后，又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文化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近两千年的道教史，大致如下：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道教在东汉后期形成实体，创立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民间原始教团，神仙方士的团体也开始出现。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改造发展，道教的经典教义、修持方术、科戒仪范渐趋完备，新兴道派孳生繁衍，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从早期民间宗教演变为成熟的正统宗教。

隋唐至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尊崇，道教极为兴盛。唐玄宗、宋真宗、宋徽宗，都是崇信道教的著名皇帝。他们编造天神显灵和天书降世的神话，优待道士，下令编修《道藏》，修造宫观，使道教的社会影响扩大。道教的哲学、养生术、炼丹术、符咒法术及科仪规章也更为完善。但是道教被利用为神化封建帝王专制统治的工具，部分上层道士腐化骄奢，也导致有识之士对道教的批评。

晚唐北宋以来，道教内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兼融儒释道三教思想，以修持内丹术为主的金丹道派开始兴起。到了南宋金元时期，道教发生变革。在华北出现了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等新道派，南方出现了金丹派南宗、天心、神霄、

清微、净明等新道派，早期的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在教义和道法上也有革新。宣扬三教合一，注重内丹修炼，是这一时期新道教的主要特点。

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中国传统社会进入晚期，日趋腐朽没落，作为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也陷入停滞僵化。这一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社团的兴起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近代中国道教承明清余绪，未能振兴。时至今日，道教已丧失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地位。但如同儒学和佛教一样，道教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风俗民情，仍有着很大的影响。

综观道家与道教发展的历史，及其教义信仰、修持方术、制度仪式，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点。道教的思想教义，融合自然法则与神圣法则、一元论宇宙观与多神信仰、出世精神与在世功德。符合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内圣与外王结合的传统。道教的修持方术，主张性命双修，炼形养生与心性修养并重，巫术道法与科学技术混融不分，具有东方文化“神秘主义”的特色。道教的组织形式则上下兼备，民间性的非法教团与官方化的合法宗派交替发展。其宫观管理制度从传统的家长制、丛林制，到现代社团法人制并存。这些特点都与西方宗教有明显的区别。

两千多年来，道家与道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道教的神仙信仰和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浪漫主义色彩和自然

主义审美观念的形成影响尤深。道教的俗神崇拜活动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娱乐水乳交融，息息相关。道教的服药炼丹方术，对中国古代化学和药物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其行气、房中、存神、内丹等养生方术，则与中国传统医学和人体科学有密切关系。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人士。

本书是有关道教历史的普及性读物。编写这本小书，旨在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有关道教的历史知识。笔者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集体编写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道教文化面面观》。这两本书的撰写者都是笔者的同事，他们有马西沙、马晓宏、卢国龙、牟钟鉴、羊化荣、吴绶琚、金正耀、陈兵、韩秉方。本书对各位同事的观点、材料多有吸收，尤其是有关宋元明清道教史部分吸取较多。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未能在行文中一一注明出处，特在此申明，以示笔者不敢掠美之意。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和出版社编辑们的关心和帮助，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道教溯源

1. 老庄学派的哲学思想

道家学派是道教的前身，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春秋末年的老子，被公认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据《史记·老子列传》等书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他曾做过周王朝的柱下史，是管理王室藏书的小官吏，其年岁略长于孔子。春秋末年，天下战乱频繁，社会制度发生急剧变革。老子作为周朝官吏，看到王室日益衰败，遂离周隐去。传说老子西游至函谷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请为著书立说。老子遂著书上下二篇，五千余字。因其书“言道德之意”，故后世称之为（道德经》，或称《老子》。

《老子》书中最早提出：宇宙间的天地万物，都来源于一个神秘玄妙的母体——“道”。老子所说的“道”，具有自然无为，无形无名，既看不见摸不着，又不可言说的特性；它是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浑沌混一的原初形态，又是超越一切有形事物的最高自然法则。大道无形无名，却孕含着一切有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说：从空虚无形的道首先生出浑沌的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冲和而化生天地万物。这就是道家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基本理论。

与道相对的另一概念是“德”。德的意思是得道，即认识和体验道，按照道的自然法则修身治国。老子把“道”看作神秘的世界本源，因此反对人们学习具体的知识，被各种纷芸复杂的外部现象所迷惑。他主张人们去直接体认隐藏在不断变化的事物之中的道理和法则。体认的方法是闭目塞听，绝圣弃知，涤除玄览，致虚守静。即闭塞感官与外部事物的接触，放弃主观成见，使内心清静无欲，达到与自然之道完全相合的“玄同”境界。这样才能体悟万物皆根源于道，并最终复归于道的真理。

在老子的思想中还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美丑、善恶、祸福、有无、难易、高下等对立现象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且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物极必反，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事物的变化运动，循环往复，最终仍然复归于静止不变的道。所以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反映了部分贵族学者在社会大变革中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减少战乱争夺的心情。他主张圣人（即统治者）治国修身，皆应效

法天道自然，遏制贪欲，贵柔守雌，清静无为。反对儒墨两家倡导礼义、尚贤有为的政治伦理学说，认为这是造成道德沦丧，使人民争夺难治的原因。他的政治理想是回到古代小国寡民，风俗纯朴，人民自足常乐，与世无争的社会状态。

总而言之，老子发现在纷纭复杂的事物之中，存在某种稳定的、支配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并且以这个法则作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真理和治国修身的指导原则。老子把这一普遍法则命名为“道”。他以天道自然的观点取代了天神创世的观念，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老子之后，战国中期的庄子发展了道家的学说。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做过地方小吏，生活穷苦潦倒，而志趣高尚，傲视王侯。《史记·老子列传》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其文剽剥儒墨，汪洋自恣 。现存《庄子》一书，是代表庄子及其后学思想的集体著作。

庄子的学说继承了老子以道为万物本源的宇宙论，以及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并且引申发挥，从而得出万物齐同、物我为一的“齐物论”思想。他认为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别，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的争论，皆因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评判标准不同而致，并非客观事物本身性质有什么不同。如果站在“道”的高度来观察，则万物相通为一，是非难分，彼此无别；大小多少、远近高低、美丑贵贱、生死成毁，这些都无所谓不同。既

然万物都相通为一，所以人们就不必分辨彼此，争论是非。庄子希望人的认识能够达到混同物我，泯灭是非，彻底忘掉一切矛盾和差别的境界，这即是“坐忘”。就是说要超越认识主体的限制，使自我与大道相通，从而彻底忘掉物我彼此的差别。

庄子还是一个宿命论者。他说：“死生，命也。”人生有寿夭贫富、穷达得失的差别，都是自然命运的安排，人对此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惟有抱着达观的态度看待生死命运，顺从自然，泰然处之。生不喜，死不悲，得之不拒，失去不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样才能成为精神超越自由的人。相传庄子死了妻子，鼓盆而歌，前去吊孝的朋友惠施感到奇怪。庄子对他说：人本来没有形体生命，后来因气的变化而有了生命，又因气的变化而死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转一样自然而然。死去的人已安然寝息于大自然中，活人却为之嗷嗷痛哭，这是不通乎命运。庄子似乎看透了生死利害、名誉是非之争对人类本性的戕贼束缚，向往能够达到忘却是非，挣脱名利枷锁，不受任何世俗牵累，精神自由快乐的人生境界。这样的人被称做“至人”。他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但是庄子所向往的自由境界，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他所处的是一个战乱争夺的时

代。被权势和贪欲所支配的诸侯王公们，正在为争夺天下而拼死决斗，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正日益加重。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死尸堆积如山，披枷戴锁的人成行成串，庄子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痛斥统治者是窃国大盗，讽刺那些为统治者奔走乞赏的人是“舔痔者”。他与老子一样，在政治上也主张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反对儒家标榜的圣王之治。认为儒家标榜的“仁义”，不过是统治者掩盖其窃国行为的遮羞布。他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民与禽兽杂居，不知有君子小人之别的“至德之世”。

老子与庄子的学说，都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在动乱变革时代悲凉痛苦的心情。他们以过人的才华，清醒地看到了文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为物役”。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技术、财富和权势所役使，物欲横流，以至丧失了内心平静和纯朴自然的本性，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争夺；被自以为是的偏见所束缚，以至无法相互理解沟通，陷入无聊的争辩。生命不得保障，精神不得自由快乐，这样的社会和人生是多么可悲可痛。“夫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的内心比老子有着更深的悲哀，他对文明异化的批判也更为愤激，对精神自由和人生高尚境界的追求更加迫切。老子和庄子提出的顺任自然，与世无争，无为而治的修身治国思想，虽然难免消极保守的局限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智慧，也吸引了后世许多善良的人们。

2. 黄老道家的治国方术

先秦道家学者除老庄之外，还有战国时活动于齐国稷下学宫的田骈、慎到等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些稷下道家的学说，主要是为齐国统治者服务的政治理论。他们以老子因循自然的学说为本，吸收齐国管仲学派的法治思想，提出尊君任法，以法治国。他们主张“去知去己、无用圣贤”。就是说不以自我偏见好恶或圣贤的思想标准治国，而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治理国家的统一标准。君主宫长及其亲属都必须遵守法律，做到“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老庄学派和稷下道家分别继承了古代楚国和齐国的文化传统，它们的思想理论是当时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向君主专制社会转变的产物。到了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已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百家合流”的趋势。各家各派的学者，都试图吸收诸家学说之长而建立新的思想理论体系。“黄老道家”，便是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假托黄帝、老子名义，在继承早期道家思想理论基础上，吸收诸子百家学说之长而形成的新道家学派。这个新学派的主要著作，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汉初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等书。

汉初黄老道家继承了老子以道为万物本源的宇宙论，但又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以阴阳气化理论解释道生天地万物的过程。《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合气）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这一段话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是更为完整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

但是黄老道家学说的重点是讲如何运用天道自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他们所讲的治国之道，更多受到稷下道家思想的影响。首先，他们认为治国者必须效法天道，建立一套完整而稳定的法律制度。有了法度，判断是非曲直、用人办事才有统一的标准，赏功罚过才能公正。人人都遵守法令，各安本分，不因自己的爱恶私欲违犯法律，社会才能统一安定。所以，黄老家虽然也反对过多的繁礼苛法，但并不非毁仁义，废弃法令，不反对任贤使能，这与老庄的思想有所不同。其次，黄老道家对“自然无为”思想的解释，也与老庄主张消极退让，反对主观人为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意思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指人的思想行为都符合客观自然法则，因循自然，应时制宜，“循理而举事”。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治”，也不是不要君主官长治理国家，而是“秉要执本，

清虚自守，无为自化”。即君主在上面把握政治纲要，但不过多干预臣下的具体施政措施。同时要克制自己的贪欲野心，不干扰人民的生产活动，“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这样才能使人民自然安定归顺，收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

黄老道家的治国理论，对老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由于它适应了汉朝初年民生凋弊，急需革除秦朝暴政苛法，使人民休养生息，社会恢复安定的现实，因而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相传汉初名臣曹参在齐国做丞相时，向黄老学者盖公请教治国安民之道。盖公告诉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于是曹参拜盖公为师，以黄老术治理齐国九年，百姓安定，曹参亦被称为贤相。后来曹参接替萧何做了汉朝中央的丞相，仍然无为而治，所有政事都遵循萧何所定的法规，无所更改。他选择的部属都是些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而那些花言巧语的官吏则被斥退。曹参日夜饮用美酒，无所事事，有些官员和宾客想来劝说他，都被他用美酒灌醉，没机会张口说话。汉惠帝怪曹参不管政事，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去劝他，被曹参怒打二百鞭，斥之曰：“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言说的。”后来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你怎能这样整治曹窋，是我让他去劝你的。”曹参对惠帝说：“陛下您自认为德行比高祖皇帝如何?”惠帝说：“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呢？”曹参又问：“那么陛下观察臣与萧何谁更贤能？”惠帝

说：“似乎你也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所说极是。高祖皇帝与萧丞相安定天下，制订了完善的法令。现在陛下无为而治，臣等安分守职，遵照执行他们的法规就是了，这不也很好吗？”曹参就这样做了三年丞相，无为而天下大治。老百姓都歌颂说：“萧何为法，整齐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民安宁。”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被后人称作“萧规曹随”。

继惠帝之后的汉文帝、景帝也实行无为而治。据《史记》记载，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好黄老之学，所以文帝和太子都读黄帝、老子之书，以黄老思想治国。汉文帝提倡节俭。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预算需花费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花费太大，于是决定不造了。文帝穿着次等丝料做的衣服，宫中爱姬的衣服不能长得拖地，屋里的帷帐不许绣花。为他建造的陵墓只许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他对内提倡节俭，减免赋税，对外与匈奴和亲而不用兵扰民，刑法宽松，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礼义大兴。汉景帝继承清静无为政策，几十年间，生产发展。国库里粮食太多，只好露天堆放。铜钱多得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文帝、景帝以黄老之术治国，使国家富足，人民安定，史书称之为“文景之治”。

汉景帝时，有些人想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景帝之母窦太后好读《老子》，有一次问儒生辕固：“老子书如何？”辕固回答说：“不过是些做

仆人奴婢的道理。”太后大怒，命令他与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偷偷给了一把宝刀，辕固才未被野猪咬死。景帝死后，16 岁的汉武帝继位，政权仍由太皇太后窦氏掌管。丞相田玢等人好儒学，企图建立上下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让诸侯王都离开京城回到他们自己的封地去。于是这些人纷纷去太后那里说田玢等人的坏话。这时御史大夫赵绾因为窦太后好黄老，就上书武帝，建议今后皇帝有事不要再请示老太后。窦太后闻之大怒，结果赵绾被迫自杀，田玢等人被罢官。又过了 6 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亲政后，才重新起用儒生。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盛行近 70 年的黄老之学，从此失去了作为官方政治学说的地位。

3. 秦皇汉武求仙的故事

道教教义的另一主要来源是“神仙家”的信仰和方术。神仙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最初由燕齐沿海地区的某些方术之士创立。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齐威王、宣王之时（公元前 356～前 301 年），齐国有驺衍等人宣扬“终始五德”之说，而燕国方士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这些燕齐方士宣称：渤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禽兽皆为白色，以黄金白银为宫阙，有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凡人未至三神山时，远望之

如云；将要临近时，三神山反居水下，或被风吹引而去，终莫能至。这里所谓的“三神山”，其实只是渤海中常见的海市蜃楼景象。方士们却借此鼓吹去海上寻仙采药，以求长生不死。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听信谣传，都曾派人下海寻找三神山和神药，未能成功。然而“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而兴，不可胜数也”。

秦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巡视郡县，去山东泰山、琅琊等地封禅祭神，刻石记功。事毕，有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求与童男童女去求仙。始皇信其言，派遣徐市率男女数千人同去海上。其后四年，始皇东游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又使燕人卢生、韩众、侯公等入海寻找仙人和不死之药。这些燕齐方士当然找不到真的仙人仙药，因此就编造谎话欺骗皇帝。

燕人卢生首先从海上归来，奏称：臣等寻找灵芝奇药及仙人不得，因为有“恶鬼”为害。现在皇上应该隐秘行踪，以辟恶鬼，恶鬼辟则真人将至。“愿皇上所居宫室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信了这套鬼话，下令在京师咸阳二百里内的行宫，皆以甬道相连，围以帷幄，内置钟鼓、美人。皇帝每日巡幸行宫，随从者不得泄露其居处，“有言其处者罪死”。有一天，始皇巡幸梁山宫，望见山下丞相李斯出行，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满。随从中有人将此情况密告李斯，其后李斯外

出时便有意减少车骑。秦始皇知道有人泄露其语，大怒，下诏拘捕当日在身边的随从，把他们全都杀掉。此后谁也不知道皇上每日的行踪居处了。方士卢生虽然骗得皇上宠信，但心里仍惴惴不安。因为他知道，按照秦朝法律，方士进献方术两次不灵验，便要杀头。于是，卢生便偷偷逃走了。秦始皇听说后勃然大怒，痛恨方士空费钱财，不得仙药，竟然还敢诽谤自己。他抓不着卢生，便迁怒于在京的儒生，下令御史查办。儒生们转相告发，牵连出四百六十余人犯禁。遂于公元前 212 年把他们全都坑杀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走到琅琊。这时徐市因多年入海求仙，耗费巨大而未得仙药，恐受谴责，于是诈称：蓬莱仙药可得，但常为大鱼所苦，所以去不了。愿请善射者同去，见到大鱼就以连弩射之。于是秦始皇下令入海者携带捕大鱼的工具，准备好连弩。他们从琅琊北上，路过芝罘（今烟台），见到大鱼，射杀一头，但是终究也没找到仙人、仙药的踪影。秦始皇从海上快快归来，走到河北沙丘就病死了。

秦始皇求仙失败的教训并未被后代统治者所吸取。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汉武帝又步其后尘。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登极后，有齐人李少君进献“祠灶谷道却老方”，宣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